

永葆奉献赤诚 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先锋

——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蜀南气矿矿长、党委副书记唐建荣

熊晓奔 罗卫东 王超

2021年,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蜀南气矿本部的天然气日产量突破1000万方大关,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蜀南气矿矿长、党委副书记唐建荣站在蜀南气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先锋突击队最前列,经历气矿重组改制的阵痛、低谷的坚持、爬坡的迂回,自信扛旗开启气矿“油气并重、常非并举、新老并进”的发展新格局。蜀南地区仅用三年时间实现年产气量从48亿方到120亿方的跃升,气矿获得“全国模范职工之家”“中央企业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状”等多项荣誉,唐建荣荣获“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在治水攻坚中担当重任

2002年,蜀南地区天然气年产量从当年占全国总产量一半的49.8亿方,跌落至11.42亿方的“谷底”。这一年,蜀南气矿由川南、川西南两个老矿区重组而成,这一年,唐建荣成为气矿一名年轻的气田开发工程师。

气量逐年走低,水是“祸根”。面对蜀南气田生产了数十年的老气井,油藏工程专业的唐建荣正好一身本领可以施展,他和团队走上了气田气藏“治水”攻

关历程。没有经验可借鉴,没有成熟技术可用,无数的日夜里,唐建荣与同事们“跑井场、住现场”,一口井一口井地试,反复对井下状况、地面设施进行调查分析和工艺探索,枕着气井的跳动脉搏入眠。在川南边陲的沈公山、大洲驿等气田所在的大山中,他一扎进去就是整整6个年头。

靠着这份啃硬骨头的拼劲和水中捞气的韧劲,唐建荣带领开发团队最终确立了“低排低采,低排高采”的蜀南治水方案,率先形成国内有水气藏开发系列理论和技术,成效显著并在业内广泛推广。其中,将这一理论技术运用的最佳典范——“一田一策”“一井一法”“一题一诊”的江安作法应运而生,创造了十年零递减的稳产传奇,蜀南老气田春潮涌动,天然气产量止跌回升。2009年年产气量16.18亿方,其中排水采气井增产近3亿方,老矿区迎来柳暗花明新阶段。

在创新转型中实干兴企

2013年,正值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唐建荣在这一年担任蜀南气矿矿长。在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历史使命之下,推动蜀南天然气大发展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唐建荣带领的这支石油队伍肩上。

进入新时期,唐建荣秉承科学管理的现代化企业理念,将“页岩气规模建产、高石梯高效开发、老气田保产保效”调整为气矿新三大工程,蜀南气矿发展梯次逐渐明朗,发展目标和攻关方向更为精准。

蜀南气矿作为国内页岩气开发的排头兵,唐建荣主动和专业团队一起开展页岩气评价和先导试验,2010年钻成中国第一口页岩气井威201井,实现国内页岩气从无到有的突破,进而锁定长宁、威远以及泸州深层核心建产区,为蜀南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百亿页岩气田作出了积极贡献,页岩气成为我国天然气增储上产最为可靠的中坚力量。

多年来,唐建荣带领全矿干部员工依靠改革发展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坚持科技、管理双驱动,集中力量攻关增储上产关键技术,形成了寻找规模储量的地质研究方法,培育了页岩气高效开发和高石梯常规气高产模式,解决了系列“卡脖子”技术问题,创造了区域探明储量超万亿方,年产量突破百亿方的历史突破。

在奉献能源中践行初心

一路走来,蜀南气矿作为中国石油宝石花的鲜艳一角,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矢志不渝地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为责任使命,



唐建荣在生产一线检查设备情况 任何明/摄

唐建荣始终牢记这一情怀和担当。

“天然气是化石能源中的清洁能源,绿色发展则是实现党和国家‘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题中之义。”唐建荣率领气矿领导班子积极响应号召,加强顶层设计研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质效双优、安全绿色、共建共享”的新发展格局。

实行“绿色石油地震勘探”,有效防治重点污染源,开展大型机电设备节能降耗工程。“十三五”期间,气矿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两类主要污染物分别下降了20%和24%,成功实现了增产减污。

秉持“开发一个气田、造福一

方百姓”的开发理念,唐建荣大力推动供气民生工程建设,改善供气条件,着力打通荣昌—大足地区、内江主城区、泸州江北片区等供气瓶颈。2020年,蜀南气矿为川渝贵3省市、35个区县共计133家大中型企业和300多万户居民提供了安全稳定的清洁能源122亿方,为打响蓝天保卫战和助推地方经济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三十余年如一日,奉献能源不停歇。唐建荣正带领团队跳起摸高,瞄准实现新目标,继续肩负着做好助推西南油气田公司“上产500亿、奋斗800亿”主力军的责任和使命,在祖国能源事业建设的征途上步履铿锵。

现代企业管理本土化的实现路径——“心学”管理

杜鹏 曹政

王阳明创设的“心学”,是在瑰丽多彩、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不断将儒释道三家进行集合成一基础上形成的。从龙场悟道到创立学说,构建以“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核心内容的“心学”,其本身就是践行“心学”的写照。“心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着光彩夺目的表现,从曾国藩运用心学修身养性平天下,到毛泽东主席在其文章《心之力》中借鉴心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有别于西方价值体系的“新学”,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王阳明心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为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方向指引。这些都说明“心学”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西方管理学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源头,它是作为西方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进入中国的,其中德鲁克作为管理学之父广为人人们所熟知,他构建了西方管理学的体系,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唯一的权威就是成

就”。德鲁克对管理的认知,与“心学”内涵有重合之处,这说明“心学”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有宏观价值构建的作用,也具有企业管理应用的功能。例如“心学”主张“有事时省察克治”,从企业管理角度看,要求经营者修身正己,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不断以“良知”为指引,锤炼“心上功夫”,在“事上磨练”中深刻认识自己和别人在企业中的角色,达到知行合一,实现企业经营提升的成效。

目前,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中“心学”管理理念与措施没有完全推广应用,重要原因是没有找到“心学”与现代管理学的契合点,忽略了“心学”与现代管理学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忽视“国情”“社情”“民情”,进而丧失了推进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创新发展的重要契机。“心学”主张“愚夫愚妇”皆可懂,“人人皆可成圣”,这些主张与现代管理学聚焦微观组织功效高度契合。正如“心学”确立是建立在对儒释道三家学说不断相互诠释、相互批评、兼容并包基础上的。符合现代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一定是将传统优秀文化和西方管理学“出入佛老”后才能确立。

“心学”与德鲁克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共同之处表现在,首先都强调在管理实践中要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并且将知识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去检验。德鲁克在阐释管理本质时明确实践在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它是检验管理成效的最终标准。“心学”中的“知行合一”,知是基础,行是目标,知行主客观相一致,以行定知,强调实践的终局检验。其次,两者都从微观入手来调适宏观,“心学”主张“致良知”,加强个人修为,并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西方管理学,也注重个人在组织尤其是微观组织的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并附之形式措施,例如进行团体建设促进组织凝聚力的提升。最后,“心学”主张人人通过修行都可成圣,是将传统的儒家精英修行目标进行调整,强调每个人的自我管理,实现高阶目标。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并提出了“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的主张,最后形成目标管理的八要素和七步骤,由此可见目标管理是西方管理学的基础构建。

“心学”与德鲁克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不同之处核心是两

者的价值取向和哲学认识不同,具体体现为,一是“心学”的目标要求主要是内化指标,能应对外在客观情况的万千变化。西方管理学的目标设定依据所谓理性认识,建立成体系的指标体系,优势自不多言,然而面对外在的种种变化,有机械应对之嫌。二是义利观差异巨大,“心学”强调义在利前,修为第一,与现代企业管理中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不谋而合。西方管理学主张义利结合,似乎完美,但遇到社会责任承担是否能完全自洽值得怀疑。

比较“心学”与西方管理学异同基础上,做好两者的融合形成新的指向性理论指引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必由之路。现实中缺陷是将中西管理思想机械对应,所谓融合没有深度理论构建和管理实践检验,极易出现理论阐释与实践两张皮,道理大而化之,没有管理实操性。因此,以“心学”为理论根基融合西方管理学体系的进程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心学”管理理论在企业不同情况下的应用场景,让它能切实地指导企业管理实践,这也契合“心学”自己的“知行合一”的主张。

“心学”管理企业的应用场景有多元存在。在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上,“心学”“知行合一”的理论有助于在管理规范、目标设定等管理行为中,使得员工树立岗位核心目标,坚定践行岗位职责,通过将企业战略在岗位履职中,推动员工的实践养成,助推企业战略落地结果。在企业产品定位上,将“心学”的良知内容应用到企业产品的标准设定上,以产品良知调适客户关系,以义为先利随义走来实现双赢。在企业管理者素质建设提升中,以“有事时省察克治”为指引构建规范体系,促进企业管理者政治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品德素质、身体素质的全面提升,助力管理者建立正确的人际知觉,克服偏见达到知人善用。

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本土化是其在市场竞争中必须应对与解决的核心问题,“心学”融合西方管理学即是顺应当下时代要求,也是排解企业管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杜鹏系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曹政系国药金投(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